



THE DEFENCE MINISTER
UP AND DOWN

国防部长浮沉记

马谔 佩璞 马泰泉 著
昆仑出版社



为人知的庐山会议内幕

深意笃的赤子衷肠

绝人寰的法西斯手段

新中国纪实丛书

MINISTER
UP
AND
DOWN

国防部长浮沉记



马谔 佩璞 马泰泉 著 / 昆仑出版社

· 新中国纪实文学丛书 ·

国防部长浮沉记

马轲 佩璞 马泰泉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1·字数 237,000

1989年8月第1版·1989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50,000—100,000

ISBN 7-80040-160-X / I · 141

定价：4.20 元(膜)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序

李 锐

1959年的庐山会议，至今30周年了。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并进一步向党内发展，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视为是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运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发动“人海战术”，要求“拔白旗、插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口号，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他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努力的作用。然而，这个大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现实和理想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不能不有所冷静，寻找解决问题的决策。庐山会议前的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这半年中的主题就是纠“左”，整顿公社的所有制，对群众退赔，修改一些过高的指标，等等，

以便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

毛泽东的认识，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因此，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表现为把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庐山会议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嚆矢。

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着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

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了党内。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为更好地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提出的正确意见，视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而且尖锐到这种程度：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

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折点是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评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于是整个会议形成一边倒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人算历史旧帐，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不然就得“全党共诛之”，那时人们就已经感到有这种气势了。

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说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对于各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

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历史的不幸是，几年之间，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顺利进行，真可说是“接二连三的胜利”，使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多年来领导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为全党所公认；也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从来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几乎归功于毛泽东个人，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几十年在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的影响，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理所当然把毛泽东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们的革命意识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泽东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上书言事伤害了毛泽东。老师劝说彭德怀做

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一下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直到7月23日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账，抓调整。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剪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柯庆施、康生为首的一些人，都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他们决不服输，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也就促成毛泽东的主观武断，以为彭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调的作用。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之后，就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的发展，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会。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果，就是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全局性的错误。

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当年比给政治生活蒙受

的危害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1959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步入严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严峻的现实。1960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计划完成钢产量1,840万吨，并提出了八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值得庆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和民族是决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犯过的错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非功过作出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历史证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经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败的；一切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已经和正在卸去，我们会更轻装前进的。

〔注〕此文原题为《庐山会议的教训》，载中央党校所编《理论动态》1989年第818期。经作者李锐同意，特摘要发表，作为本书的序言。

目 次

序	李 锐
第一章 前奏	(1)
第二章 骤风	(27)
第三章 淫雨	(103)
第四章 闲云	(144)
第五章 偶晴	(185)
第六章 复劫	(222)
第七章 遗恨	(276)

第 1 章

前 奏

1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多次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实现千百年来一个民族繁荣富强的梦想，对于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将预示着什么？

在崇尚强权的世界，一个民族要真正崛起，燃亮自己的尊严，靠什么支撑？

——这，正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和戎马一生的将军们绞尽脑汁的命题。

按毛泽东的话说：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这是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的预见。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已经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4月15日，毛泽东用非常引人注目的词句表达了改造中国的决心和他认为可以做到的信心：“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6月19日，毛泽东看了有关部门汇总各部向中央汇报的钢产量指标后说，会议（指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定的800万至850万吨太低了，干脆，今年钢铁比去年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现在看来，我们3年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的把握。

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很快，《人民日报》将“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

.....

这时候，毛泽东和党的领袖们已把威望和信念押在成立人民公社从而一举摆脱中国的贫穷落后的状态上面。被从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的中国人民，以感激涕零、无限崇敬的心情表达对党和领袖的信赖。他们坚定不移地朝着党和领袖指引的金光大道奔跑。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决议要求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和农业生产大跃进，使粮食产量达到6,000—7,000亿斤，棉花产量达到7,000万担，并由此提出“以钢为纲”，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一声令下，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建土高炉百万座，以付出一比几十倍的代价炼出300万吨效用很差的土钢、土铁。

——这种连祖先都会感到幼稚可笑的极端原始的做法，不禁引起外国人的嘲讽和不可思议。他们在看中国人的笑话，看中国在远离世界的一个角落里独自在痛苦和挫折中折腾。他们

难以想象中国人的革命热情和纯洁思想能够弥补技术能力和物质手段的不足。

列宁相信人的意志在改造现实时的力量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中国人却可以把它扩大到整个自然。

斯大林也曾有过可以把沙漠变成绿洲、西伯利亚变成花园的雄心，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不存在沙漠和西伯利亚。

然而，被外国人读称为“毛泽东的空想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直到“文化大革命”都确认为是不容置疑的整个经济工作的核心。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为给中国找到了通往共产主义的捷径而欢欣鼓舞，一切疑虑和怠慢都被斥之为妄自菲薄或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若要反对或阻挠则是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背叛！

在当时的报纸上每天都可以看到“高产卫星”的出现：小麦亩产达到 7,320 斤，早稻亩产达到 36,900 斤；一向低产的大西北竟提出耸人听闻、无可置信的指标：1958 年亩产达到 13,100 斤，1959 年要达到 2,000 斤；1962 年要突破 3,000 斤。进而有人写文章说：“许多生动的事例表明：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地区。只有不良的耕种制度，没有不良的土地。”更为形象的说法，是当时流行最广的两句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据说，为了这些口号，毛泽东的老朋友、参加过党的“一大”的理论家李达，曾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但是毛泽东坚持认为这些口号是正确的，拒绝了老朋友的意见。

我们不难想象，毛泽东当时是以何等的从容不迫和眉宇间泛露出何等乐观的神情，来瞻望他作为中国革命最富有魅力的最高领袖所描绘的即将展现在人民面前的美妙前景和在有生之

年建造一座比金字塔还雄伟壮丽的纪念碑：一个在未来的几世纪内应用他的思想和崇敬他的名字的中国。

10月1日，“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公社化”的喜讯，以无线电波发射的速度传遍全国。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知名度颇高的关锋，当时曾将湖南农民创作的一首动人而不失天真的“颂歌”引用到他的文章中：

建立公社如上天，
一夜赛过几千年。
利刀斩断私有根，
开辟人类新纪元。

很容易找到惊人的例子来说明“浪漫主义”被中国人继承和发展到了最光辉的顶点。

在似枪若弹的爆竹声中，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1亿2千多万户）的农民欢天喜地参加人民公社，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与此同时，全国各条战线也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的“大跃进”，争先恐后地加入放“卫星”的行列。

——看有多壮观吧，六亿神州唱大戏；气势磅礴，山河摇动，不管你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不容超脱地要扮演剧中的某种角色，尽管有很多人闹不清演的是正剧、喜剧还是悲剧，也得纷纷登场。于是，理想和幻想竞相生辉，真理和荒谬相互媲美，雄心和野心同样夺目，时运和危机交错扭结……

事实证明大自然和科学技术比人们想象的更难屈从于人的

意志。历史有它发展的必然规律。民族有它自我约束的机制。物质和精神的贫困必然造成愚昧，愚昧必然造成轻信，轻信必然造成狂热，狂热必然造成灾难。在狂热的冒险中建立人民公社的结果使农村陷入混乱，使刚刚恢复健康肌体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据有关方面统计的材料表明，大跃进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荒，而活人每天需要摄入的热量却低于1,500卡路里。据说，当时毛泽东每天也只吃几片地瓜干来体慰人民的苦情……

现实在呼唤，历史在呻吟。

这时候，我们书中的主人公该出场了。尽管当时有那么多人不理解，但不得不承认——非他出场不可！

他就是这样一位个头不高且微微驼背的老人，一位曾以“猛张飞”的尚武精神指挥千军万马摧枯拉朽、已被战争的硝烟熏白了双鬓的老人。人民称他为“开国元勋”，他说自己是“六亿神州一分子”。

此时，他正以冷峻的目光注视着这规模空前的场景——他全身心眷恋并全身心为之奋斗的神州大地。

毋庸讳言，当初他也是虔诚地希冀那千百年的梦想能神话般地降临人间。但当他像一个幽灵，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步履天涯海角之后，神话破灭了，得到的是极度的痛悔，以致使他突然对为之奋斗的昨天发生质疑。然而，昨天的故事在老人那书页似的皱纹里写得清清楚楚。他一度陷入迷惘，显得焦躁不安，当一股无名火冲上来时就拍桌子骂娘。他突然又下意识地自谴自己是否老了，不适宜了，该淘汰了。然而，毫不衰竭的活力和清醒的理智足以使他感到：最炽热的激情对他适宜

的，最深沉的忧虑对他是适宜的；灵敏的嗅觉、知觉，被生命的光辉照亮的眼睛、勇气和意志，是为他而存在的！他那圆而大的头颅、雕刻般四楞四方的下颚、结实的手臂和大腿，无不奔流着热情、愿望、希求和抱负。他把疑惑、冷峻的思索投向大地——投向这记载着历史沉浮、民族兴衰的大地；投向这渗透着百姓血、英雄血也渗透着强盗血的大地；投向这震撼着巨大创痛和忧患的大地；投向这燃烧着希望有时也毁灭着希望的大地；投向这极其令人振奋却又哭笑不得的大地……

大地并不感伤，沉默是大地的语言。

大地的真理永远在那里期待着，在它的外表下面潜藏着它所有的属性——不可抗拒的生长机能和效果！

“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这样搞叫共产主义，那我不叫彭德怀！……”

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上他放了一排“重炮”。在会议小组会上他将他在福建、黑龙江、内蒙古、陕西、青海、甘肃等地考察的情况作了长时间的汇报发言，并直言不讳地对中央在1958年施行的某些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提请中央注意：在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数字上要实事求是；在制订1959年粮食指标计划时要留有充分余地……

他的意见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

毛泽东代表中央讲话，肯定了1958年的大跃进“成果”，特别着重讲了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问题——他娴熟地将战争术语及战争方法运用到经济和科学的领域：

“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